

书林守望丛书

文化的积累与追求

熊国祯 著

本丛书得到韬奋基金会资金资助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熊 國 禎

书林守望丛书

文化的积累与追求

熊国祯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积累与追求/熊国祯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9

(书林守望丛书/吴道弘主编)

ISBN 978-7-81119-539-2

I. 文… II. 熊… III. 编辑工作—文集 IV. 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453 号

书林守望丛书

WENHUA DE JILEI YU ZHUIQIU

文化的积累与追求

熊国祯 著

项目统筹:张 巍

责任编辑:张慧芳

责任设计:张 朋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书林守望丛书》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友先 王万良 卢玉忆 冯俊科 伍 杰
刘 杲 徐柏容 巢 峰

编委会主任 吴道弘

编委会副主任 郑一奇(常务) 陈芳烈 韩方海 杨学军
陈 鹏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维玲 方厚枢 邓中和 宋应离 邵益文
林君雄 林穗芳 周 奇 胡德培 赵 洛
俞 斌 聂震宁 钱锦衡 曹培章 熊国祯
潘国彦

做文化的守望者

——《书林守望丛书》总序

柳斌杰

文化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而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承载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出版人，不仅是出版活动的实践者，而且是人类文化创造、积累、交流、传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民族精神的护卫者和时代精神的弘扬者。任何时代，治书修史者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在我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受名利诱导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出版界跟风炒作、追求市场效应一夜成名而不顾文化品位等现象时有耳闻。在种种浮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出版从业者文化品格的缺失。唯其如此，为繁荣学术和民族文化而坚守文化天职、恪守社会责任的职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尤其值得在出版界大力弘扬。

001

出版人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具有坚守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一个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它的出版事业。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一脉不绝，就在于中国历代政治家、作家、出版家、藏书家接续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尊崇历史、珍惜古籍、编修文献、善待图书、重视典藏的优良传统，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历代出版物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之后世，肩负起了将一个时代的科学文化及思想智慧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时俱丰、愈加巩固。作为新时期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的主体，当代出版工作者更加需要继承传统、关注时代，一方面自觉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整理、

批判、传承的责任，保持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以及同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文化自信力方面作出贡献，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更加坚韧。

出版人是文化创新的推动者，具有坚守文化本性的特殊责任。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基本业态，出版既有产业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必须通过创新来保持文化的独特品质和内容的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出版工作者的不竭动力和显著特征，不仅是文化积累和产品制造的组织者，而且也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和把关者，当然应当是新知识领域的开拓者和新成果的发现者、催生者。一方面，知识的保存、生产和应用，文化和技术的传承、生产和原创，都是以出版活动为基础的。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从造纸术、印刷术到当代激光照排系统、计算机王码汉字处理系统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版人率先将新成果引进出版业，引发出版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版人通过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把握时代需要，促进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而现代出版史上鲁迅发现大批文学青年、叶圣陶对巴金处女作的慧眼识珠、巴金对曹禺作品的琢璞为玉的佳话，也反映了出版人所必备地发现新人新作的创新品质。在当前的创新型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已然成为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迫切需要出版工作者发现、认识、扶持、推广，进而铺垫中华民族元气深厚的文化创新的阶石，培育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神韵独具的文化创新的活力。

出版人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具有坚守文化领土与文化阵地的社会责任。出版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文化、创造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且还在于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作出评价，通过选择、把关实现对社会风气、学术思潮、文化倾向的引导。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竹帛长存”所构成的社会认知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才唤起了“见贤而思齐”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中心凝聚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出版传播活动，将“科学”与“民主”汇聚成了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内背景下，承担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传播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其选择、把关进而引导大众的责任更加重大，需要通过对精神生产加以规划与组织，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别与加工，对文化遗产作出选择和整理，对社会信息予以筛选和传递，打造传承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不断巩固主流文化阵地。这就要求当代出版工作者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不随波逐流，不跟风炒作，不断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引导大众文化、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历史已经证明，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便失去了发展的根基。而出版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素养、文化责任、文化运作能力和学术品评能力，又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文化的坚守，不仅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项出版实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能否坚持文化本位，能否坚守文化责任，对新时期的出版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书林守望丛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新中国出版人的精神文化启示录。其中反映出的经过沉淀而彰显的文化品格，尤其应该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支柱。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一群深深地钟情于出版事业的文化守望者，他们在“书荒”时代辛勤耕耘，在“书海”时代坚持方向，恪守文化的尊严，组织、规划、策划、编辑、出版过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及具有学术价值、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工程，主持、主编过一大批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等方面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知识读物，为全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勇于开拓、后启来者的创新精神和坚守精神家园、淡泊名利的文化风骨，堪称典范。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者形成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产生更多让世界为之惊喜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文化品牌，再现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气魄。

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要在

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能开阔视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创造、包容多样的新型复合型出版人才，来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2009年7月

代序： 毕生雅好为书忙

我是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职业编辑，读书、编书、评书始终占据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划分专业时分配到古典文献专业学习，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专业主要是为中华书局培养古籍整理专业编辑的。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学习和将来的编辑工作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从196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算起，我参加编辑出版工作至今已有四十一年。遗憾的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政治运动、下放劳动，什么编辑出版业务也没有。迟至1971年6月，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我才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三组真正开始编辑业务实践。我编辑整理的第一部书稿是出版于1971年9月的十六开本的邹容《革命军》。随后又编辑了几本配合当时理论学习的“历史知识读物”，例如《巴黎公社》、《拉萨尔》、《蔡特金》等。1975年2月，我回到二编室（“文革”后期，整个中华书局编辑部被压缩为一个小小的第二编辑室，勉强应付中央交办的出版任务），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图书编辑业务。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才分开，各自恢复原有建制，逐步全面开展工作，我选择了哲学、宗教古籍为业务方向。1986年至1994年，我一度学习经营管理业务，分管过财务处、基建处和影印部。1994年年底，我又被调回编辑部工作。无论升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读书、编书、评书始终是我的兴趣所在，魂牵梦绕，须臾不离。2004年，我六十二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书局领导又返聘我继续协助看稿子。直至今日，我没有离开过中华书局，没有离开过古籍整理，没有离开过编辑出版业务。这个情况可以称得上

是“吾道一以贯之”了。书稿定名为《文化的积累与追求》，原因主要在这里。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无论风雨晦明，无论悲喜沉浮，我始终抱定一个宗旨，要为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时代环境、社会潮流相比，个人总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化工作者，个人力量虽然微薄，肩负的文化使命却时刻难忘，痴心始终不改。“万事不甘随俗转，毕生雅好为书忙。”我愿以这副自撰的联语与同志者共勉。



与老伴毕素娟、女儿熊涛合影于天安门前

根据出版者对《书林守望丛书》的要求，书稿篇幅限定在二十万字以内。这里选录的四五十篇作品主题比较集中，谈的都是古籍整理、图书评论、编辑业务，反映的是我在编辑业务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虽然日积月累，写了一些东西，却缺少系统的深刻的总结，收在这里的主要是散见于报刊的零篇短章。我在出版社里主要是一个实际干活的人，这些零零碎碎的体会与议论更能反映我日常的工作实际，反映一个编辑的所思所急与所为。阅读的专注与执著，工作的艰难与沉重，收获的欢欣与沉醉，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除将篇幅长达两万字的《略谈古籍编辑的基本素养》置于书末外，绝大多数文章均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先后排

列，并保留了发表当时的署名(文末括号中的楷体字)。这样编排，可以较清楚地反映探索的足迹、思想的脉络，也可以避免分类集中所造成的阅读的沉闷。

我写书评是郑重其事的，诚恳坦率，直言不讳。发表书评时喜欢用笔名，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普通人应该得到的民主的平等的对话资格，摆脱权势、资历、地位等因素给批评本身带来的外在影响，评者与批评者彼此可以只就评论本身交换意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共同对读者负责，以求改进图书品质。所用笔名多采用谐音方式，例如舒迅(书讯)、舒萍(书评)、肖雪生(小学生)、于有德(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郝新(好心)、梁岩(良言)、单毅(善意)、尹其明(隐其名)等。至于正式的工作总结、理论探讨或者会议发言，则署本名。

做了几十年编辑，从来都是忙着给别人编书出书，忽然有一天，有人要张罗着给自己出书，这才手忙脚乱起来，东找西寻，翻箱倒柜，收集整理了好久，也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不大拿得出手。这时才深感惭愧与后悔：平时光知道干活，自觉的总结与理性的探讨太少了。但愿这一次的仓促交卷，是今后新撰著的开篇破题。编辑学需要来自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

勉强交上的作业，衷心地希望听到各方面读者诚挚坦率的批评意见。

2007年12月24日

003

目 录

001…代 序：毕生雅好为书忙

001…整理古籍要编好目录

004…《泽螺居诗经新证》书名、目录小议

005…《老子注译及评介》的特点

007…“閒诂”不宜写成“闲诂”

008…要重视佛教典籍的校点

——《佛教经籍选编》读后

013…《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读后

016…《天仙金丹心法》漫评

023…《金瓶梅词典》琐议

031…读《苏辙集》偶拾

036…《冥报记》初读献疑

041…《宋史翼》人名索引试补

045…《广异记》琐评

055…读《佛遗教经》

058…关于《高僧传》的校勘底本

062…关于《人海诗区》及其辑录者

069…分章立目不可少

072…《声律发蒙》的作者到底姓甚名谁

074…关于《百喻经》及其今译

001

- 079…贵在尊重与互补
- 081…数词和简缩语
——试为《汉语数目词词典》改名
- 084…《无能子》篇数小考
- 088…建设性交流是书评类期刊的重要原则
- 093…关于“编校质量”的大实话
- 098…体验高雅与遭遇衰渎
- 100…沉静执著孜孜不倦的人文学者
——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 103…全面规划、区别对待与珍爱人才
——古籍整理工作漫谈
- 106…温馨的回忆，欣慰的纪念
——写在《王力古汉语字典》出版之际
- 111…景仰与怀念
——魏建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 115…重温中央指示，爱护专门人才
- 119…要重视编辑工作含量
- 122…《全清词·顺康卷》出版感言
- 125…教学、科研与出版相得益彰
——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
- 128…乐于奉献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缅怀阴法鲁先生
- 131…祝贺、感谢与诚挚的期望
——写在《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一辑出版之后
- 133…人才是事业之本
——在优秀古籍整理图书颁奖会上的发言
- 136…有益的增补，无私的奉献
——《法苑珠林校注》出版感言
- 139…以守俨先生为榜样
- 143…《启功丛稿·艺论卷》出版说明稿

- 146…一副拙联两封信
——怀念王师母夏蔚霞先生
- 150…浅谈畅销书的价值和开发要点
- 153…要重视百科全书的品牌维护与版本升级
- 155…培元固本传承民族文化的重大建设项目
——关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出版
- 157…幼学成诵，终生受用
——从《闲谈写对联》说起
- 161…“鸟语”和“唐诗”
- 163…短文深意余味长
——推荐《文字的味道》
- 165…语文修养是编辑的入门功夫
- 168…编辑规范工作三题
- 174…起书名要讲逻辑
- 176…关于修订《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 180…略谈古籍编辑的基本素养

整理古籍要编好目录

我十分赞成出版重要古籍应有索引的观点。许多基本资料书由于附上了人名索引、篇名索引以及重要名词术语索引等，使用价值大为提高。这种做法推广开来以后，不仅可以提高图书出版质量，而且将把有关的学术研究工作从初级的资料整理阶段推进到高级的综合研究阶段。我们不应低估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凡有条件的新版古籍，最好都能附上必要的索引。

在编制索引还不能普遍做到的时候，我以为：整理古籍，先要编好目录，这是一项最起码的整理工作。现在新出版的古籍绝大多数都有目录，其中不少目录是在旧的基础上做了许多改进的，较前更为方便实用，但是，从科学与实用的角度着眼，有些古籍的目录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校点本二十四史，其整理质量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目录都没有标明分册的起讫，这就给检索有关资料带来了麻烦。查找一篇作品，人们从目录上只能查到卷数和页码。由于现代印行的古籍是卷册分离的，知道卷数和页码并不能知道它究竟在第几册，人们只好根据每一册书的厚度再去推测这篇作品可能在第几册，猜准了才能拿到需要的那一册，猜不准就差前错后，来回折腾，劳神费力，耽误工作。目录是一部书最基本的检索工具。多册书的目录只有标明分册的起讫，才能充分发挥它作为检索工具的作用。重视了目录的这一作用，要标明分册的起讫是并不困难的。《论衡注释》共有四册，它就在目录上标明了分册的起讫。共分八册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则更方便，在书脊上就标明了每一册的起讫年代，使检索者可以一目了然。为方便检索而在目录编排和书籍



2002 年中华书局九十周年局庆前夕接受《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

装帧方面下过功夫的古籍是不少的，这里不一一列举。有些书的目录在某些部分上略嫌笼统而不够具体明晰，例如《公孙龙子研究》的目录只列了注译、考辨、批判、探源及附录五大项。其中“注译”一项是按篇进行的，目录中宜开列篇名细目。“附录”一项又分事略、评说、著录、注释、索引(下分名目、学派及人名、引书要目)五小项，也以开列细目为宜。有了按一定层次编排的详细目录，读者就能对全书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用起来就更方便。当然，这本书在中缝上标明了某些细目，也弥补了目录上的部分缺憾。再如《风俗通义校注》，校注者搜集整理的佚文篇幅多达将近 140 页，而且是分类按题辑录的，目录中只笼统列为“佚文”一项。该书附有应劭的传记资料，有古人序跋及著录资料，有古人读书笔记中有关的考订文字等，共计 35 篇(段)，而目录中也仅笼统地列为“附录”一项。这样，读者从目录上就无法知道本书到底附录了哪些材料。还有些书的目录未能全面反映该书的内容。最常见的是有些书在目录前面印有前人旧序，编者往往不把这些旧序列入目录。我认为，除了出版者的极简短的出版说明不一定列入目录而外，书中附件或辅文不论多少都应列入目录，以便检索。为避免造成目录的繁杂或头绪纷乱，只要在目录层次的安排上分清主次，与本书正文有所区别就行了。最近出版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质量是不错的。书中的《高适年谱》不仅考订诗人的生平事

迹，而且为高适诗文编年作了论证，它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目录上却没有《高适年谱》的位置。

总之，目录是一部书的最基本的检索工具，它应当全面而具体地反映全书的内容，而且要编排得科学和便于使用。顺便提一下，目录的位置也要醒目。过去有的书把目录排在第一册的中间，或者是今人序言与古书原文分界的地方，或者是主文与辅文(包括前人序跋、今人序言、整理凡例等)分界的地方。有时序言洋洋洒洒，篇幅很长，有时附件或辅文较多，读者打开书往往不能很快找到目录。我觉得目录还是放在一本书的前面比较方便醒目的地方为宜。如果目录前占用的篇幅较多，就应当在全书的编排设计上做些改进，或者干脆把目录排在最前面。(肖雪生)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95期，1982年9月20日